

宣化辽墓

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

李清泉 著

考古新视野丛书



文物出版社

考 古 新 视 野 丛 书

宣化辽墓： 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

● 李清泉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红

封面设计：张振钢

周小玮

责任印制：陈 杰

责任校对：李 薇

陈 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李清泉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8.3

(考古新视野丛书)

ISBN 978 -7 -5010 -2300 -4

I. 宣… II. 李… III. 辽墓 - 研究 - 宣化县 IV.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2673 号

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

李清泉 著

文物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达利天成印刷装订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 经销

850 × 1168 1/32 印张:12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7 -5010 -2300 -4 定价:32.00 元

内容提要

本书以宣化张氏家族壁画墓群为中心,讨论契丹统治下汉人墓葬艺术中的多元文化内涵,以期从中了解一些当时常见墓葬装饰内容的功能与意义,解释有关丧葬艺术题材背后的观念与信仰,以及这些艺术形式所赖以产生或演化的特定社会历史根源。同时,也期望能通过这项个案研究,窥察到辽代世俗艺术与中原汉族地区世俗艺术之间互动、交融历史过程中的某些片断,探寻到唐代以迄于辽宋时期丧葬礼仪艺术的若干变动。

专家推荐意见

李清泉的《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该论文的指导教师是中山大学的姜伯勤先生。我曾就论文的选题和内容与李清泉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交谈,在其后修改成书的过程中也曾经提供过一些建议,因此对这本书的写作经过是比较熟悉的。

对辽墓的美术史研究是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领域,其原因一是众多的考古新发现使人们惊喜地看到辽代墓葬建筑和绘画的多样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二是由于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逐渐打破“正统朝代”线性更递的年代学框架,开始探索同时异地的艺术传统,发展多线条的历史叙事。10世纪以降,辽、宋、金、西夏等政权下的美术和视觉文化的交叉发展和互动,当仁不让地成为实验和推广这种研究的一个重点。

对辽代墓葬的研究自上一世纪8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展开。在随后的20余年中,在考古、美术史及文化研究等领域里产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不断地出现着具有不同探索目标的多种类型研究手段。据我所知,在众多的辽墓研究中,本书对方法论的思考是非常突出的。作者在《导论》中对以往的辽墓研究,特别是和本书所集中讨论的宣化辽墓有关的研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讨论对象涵盖了中、日、英等文字的大量著作。在这个基础上,他发展出三项由内及外、逐渐延伸的研究和解释方法:一是把一个墓葬中的壁画看成是该墓葬的有机组成部分,探索画幅之间的内在联系;二是把属于张氏和韩氏家族的

宣化辽墓定义为一个基本研究单位,探索其结构、装饰之异同以及与地方作坊、壁画粉本之间的关系;三是把这组汉人墓葬看做是整个辽代美术中的组成部分,既注意到它们的特殊族属和文化背景,也注意到它们和当时流行宗教观念和艺术潮流的关系。

在这个方法论的基础上,作者在其后的四章中对宣化辽墓作了三方面的研究。第二章以辽代汉人墓葬为中心,将其与辽代契丹人墓葬以及南方的五代和北宋人墓葬进行了双重比较,逐渐把焦点集中到位于宣化的张氏和韩氏墓地。第三和第四章分别讨论宣化墓葬中前室和后室的壁画,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两个建筑单元中的图像既有着不同的礼仪和象征意义,又十分逻辑地构成了一套可增可减的“图像程序”。第五章集中讨论对死者尸体的处理方法和装殓方式,兼论墓室的形状和所题、刻的《陀罗尼经》,以此为根据探索佛教信仰和仪式对辽代墓葬的影响。

这四章中含有许多新颖的观点,同时也反映出作者为了证实这些观点所作的巨大努力,尽量做到考古和文献的相互证明和互相发明。总的看来,本书对材料的界定和使用相当严谨,通过采用“中层研究”的方法,沟通了对个案的细致解读和对辽代美术的宏观论述,可以认为是达到了目前国际上研究辽墓美术的最新水平。为此,我认为本书的问世会对这个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非常高兴地推荐此书的出版。

王鸣

2007.9

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代序)

文物出版社《考古新视野》丛书,收入了李清泉著《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本书既有考古学新视野,同时更具有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

本书题辞有:“谨以此书献给先师刘敦愿、陈少丰先生。”通读本书,可以相信,作者这种“新视野”的取得,与先师刘敦愿先生、陈少丰先生早年的栽培不可分割。也与巫鸿先生的启迪有关。笔者在结识李清泉之前的许多年,业已拜读过刘敦愿教授关于艺术史与美术考古的大著,至为钦敬。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间,又因为种种机缘,而与陈少丰先生时相过从。我与李清泉结缘,应该与我得知他曾问学于这两位我心仪已久的硕学这一事实有关。

李清泉本书在艺术史上的新视野,首先表现在作者选取了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以及他力图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开拓与创新。

辽代历史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成为国际东方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近年来,由于相当数量辽墓的发掘及其壁画和陪葬卷轴画的发现,辽代美术成为国际上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前沿。诚如金维诺先生在《中国绘画传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一文中指出,辽代“对绘画艺术十分重视”,“近年出土的辽墓壁画对于了解当时绘画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中国美术史自明清文人画盛行之后,唐代吴道

子和宋代李公麟为代表的人物画传统常常不能彰显。正是通过辽墓壁画的研究以及其后永乐宫等寺观壁画的研究,才使唐代以后的人物画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清泉本书从事的研究工作,将大大推进人们对辽代绘画艺术的“高水平”成就的再发现。

毋庸置疑,宣化辽墓出土之后,由于以宿白先生为首的许多硕学大家已相继做出了许多精辟的研究,故在若干问题上几乎“题无剩义”的情况下,创新工作着实令人备感艰难。可是,李清泉不畏艰难,他在认真学习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不倦地开掘,找到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研究空间和问题环节,从而实现了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探索。兹举出几点例证:

如宣化7号辽墓发掘报告将墓中发现的会棋图定名为“三老对弈图”。李清泉曾于1998年发表的《论宣化辽墓壁画创作有关问题》(载《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一文中提出:“弈棋乃唐宋绘画中的一种流行题材”,“其中北宋画家如高克明等,就曾有专门表现儒、道、释三教人物对弈的《三教会棋图》藏之御府”,因而提出“故以定名为《三教会棋图》为宜”。

先是1974年辽宁省博物馆在法库叶茂台第7号辽墓出土古画二幅,其中一幅由杨仁恺先生定名为《深山会棋图》,杨先生大文谓“原画轴无题名,根据作品内容所加”。在本书当中,李清泉根据两件作品题材方面的内在关联,结合辽墓当中频繁出现的棋局和棋子等随葬实物,揭示出这类题材是当时丧葬艺术中的一种“惯例”。这一发现,进而成为他合理解释当时丧葬艺术中弈棋题材和棋局实物背后之观念信仰和象征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这无疑是作者本书的一个创新之点。

李清泉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同时还表现为作者从“丧葬礼仪”的视角,将宣化辽墓的个案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墓葬材料有机打通,把新出墓葬壁画及其功能、意义的研究,与图像学中的礼仪、

象征、隐喻、符号研究等融于一炉。巫鸿先生在《专家推荐意见》中对本书中所发展出来的三项解释方法的赏识,尤为中肯。

例如,李清泉抓住 11 世纪中叶以后辽代辖境内多火葬墓、而且开始流行多角形墓室的新材料,研究了第五章的《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这一较之前人更有进展性的新课题,从而实现了创新的尝试和收获。作者首先从宣化辽墓墓主所采取的茶毗礼葬式入手,通过与敦煌洪誓影堂真身和广东韶关南华寺六祖慧能真身像等做比较分析,渐次讨论了宣化辽墓出土真容偶像与唐宋禅宗中保存或制作“真身”习俗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类习俗背后所反映的法身观念的偶像化问题。进而透过陀罗尼经幢对亡过尸骨的“尘沾影覆”功能,分析了多角形墓葬与陀罗尼经幢及密教陀罗尼信仰的关系。作者发现多角形辽墓中,具有“墓室与墓幢的一体化设计倾向”,认为“类似宣化辽墓内葬真容像、棺箱书写陀罗尼经咒、墓顶又多可能一度树有经幢的坟塔化墓葬”,“势必也同陀罗尼经幢的功能一样,可以‘托难思之句义,变无尽之光明’、‘开天堂之路,闭地狱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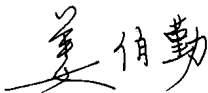
多年以来,围绕着辽宋时期的八角形墓葬建筑,国内外学者提出了许多研究的企望,如宾夕法尼亚大学夏南悉(Nancy Schatzman Steinhardt)教授 1997 年在《辽代建筑》一书中,曾注意到八角形墓葬与辽代八角形塔之间的关联,但却未能揭示出墓葬何以受八角形辽塔影响的原因。而李清泉则发现,晚唐以来柱身多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陀罗尼经幢,在与坟塔渐趋混同的历史过程中,最终促使墓葬形制向八角形或六角形方向演变。据此得出了“唐代以迄辽宋之际,丧葬礼仪艺术的总体嬗变,其中不乏佛教因素的深度影响。而导致这次遽变的关键性因素,是密教陀罗尼信仰”的研究结论。

李清泉本书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新视野,还体现在把图像学中的“类型”(genre)理论与考古学、美术考古中的“类型”研究结合起来。书中指出:贡布里希提出,“只有当我们了解了一件艺术品背后的相关习俗和惯例之后,将作品归入某一具体范畴或类型(genre),才能

确定这件作品想要表达的意义。”genre 这个词来自法语,意为“种类”、“类型”、(文学艺术作品的)“体裁”、“样式”,又可指“风俗画”。而考古类型学(typology)中通常说的“类型”(type)一词,强调的是形制上的类别。如徐苹芳先生所指出:“辽代考古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区分开契丹与汉族的遗迹、遗物的不同形制,这是中国考古学类型学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同理,艺术史上的“类型”研究,十分重视图像的“习俗功能”。所以贡布里希才强调说:“图像学必须从研究习俗惯例开始,而不是从研究象征符号开始。”

李清泉注意到贡布里希所说艺术史研究中的“类型第一”的研究和考古学中的类型研究的联系和区别,从而把二者在“习俗惯例”的研究上统一起来。从这里入手,这就避免了制造各种空中楼阁、海市蜃楼,而扎实地探求到艺术图像的真实“语境”。本书从图式与功能的角度,对“出行图”、“散乐图”、“备经图”、“会棋图”等壁画内容的意义分别做出了独到的解释。其中于“备茶图”的研究,尤见功力。笔者于1959年有幸赶上陈寅恪先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授《元白诗证史》的末班车,课堂上,寅恪先生讲到元稹和“李家兄弟”的交情时说到:“大家彻夜长谈,饮茶待旦。唐人吃茶,要将茶叶碾细成末,茶能兴奋神经,尤其是新采的春茶。”又说到:“中国茶是在开元间由和尚传到日本的。因为和尚坐禅,是半眠睡状态,不能卧倒,故宜于饮茶提神。”宣化辽墓中备茶图的发现,以及李清泉书中精彩的解释,加深了我们对寅恪先生所授课业的理解。



2007年10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目 录

艺术史研究的新视野(代序) 姜伯勤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1
第二节 辽代文化特征与辽代壁画墓	3
一 辽代文化的涵义	4
二 辽代壁画墓的发现	5
三 辽代壁画墓研究史	14
四 关于宣化辽墓的研究	24
第三节 论题与研究方法	28
第二章 契丹统治下的汉人墓葬	39
第一节 辽代汉人壁画墓概说	39
第二节 辽代汉人墓葬的比较研究	47
一 辽代汉人墓葬与契丹人墓葬的比较	47
二 辽代汉人墓葬与五代、北宋汉人墓葬的比较	62
第三节 宣化辽代张氏家族壁画墓与韩氏壁画墓	72
一 墓群的地望与契丹治下的宣化城	72
二 墓葬的分布与家族成员的系谱	75

三 墓主的身份	81
四 张氏家族壁画墓与韩氏壁画墓的内容	84
五 壁画粉本与各墓之间的关系	94

第三章 宣化辽墓壁画图像内容、功能与意义(上)

——以前室为中心	124
第一节 壁画题材的分布与墓葬前后室功能 的基本区分	125
第二节 鞍马出行图图式与意义的嬗变	133
一 车马出行图与墓葬空间	134
二 车马出行题材的新图式	137
三 冥土之旅与冠上并桃	142
第三节 散乐图与备茶图的礼仪功能	147
一 散乐图用乐的两重性:“酬神”与民间 娱乐表现	148
二 散乐图与备茶图在墓葬空间中的结构 及其功能	155
三 礼仪空间与永久的家	162

第四章 宣化辽墓壁画图像内容、功能与意义(下)

——以后室为中心	177
第一节 宣化辽墓壁画中的备茶图与备经图	177
一 备茶图与备经图的联系:论风俗场景 与风俗画	178
二 两种题材背后的信仰	186
第二节 《三教会棋图》在墓葬中的象征意义	200
一 对叶茂台辽墓《深山会棋图》的再认识	203

二 棋与墓葬	212
三 《三教会棋图》:象征的图像与艺术赞助人	221
第三节 人物角色、时间与空间——关于天象图与 家居奉侍图	230
一 关于天的图像	231
二 后室壁画中的人物角色、活动与时序关系	235
三 墓葬中的空间问题	240
 第五章 真容偶像与多角形墓葬	262
第一节 宣化辽墓真容偶像及其文化渊源	263
第二节 茶毗礼拜式与法身观念的偶像化	273
第三节 “法身”观念在世俗丧葬中的轨迹	283
第四节 多角形墓室与陀罗尼经幢	294
 第六章 后 论	333
一 图像与历史	333
二 “类型”理论与“丧葬礼仪”视角	334
三 蕃汉美术的互动交融与多民族艺术史的共同 建构	336
四 辽代壁画墓与唐辽文化变迁	337
 参考文献	340
 后 记	36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业师姜伯勤先生亦时常以学术史上的一些成功典范，教示新材料之于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汉族统治地区美术的研究，即使在现下，一般的美术史著作，对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地区的美术情况，特别是辽金美术的情况，仍然较少涉及。辽金美术之所以处于这样一种境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文献材料和传世作品严重缺乏。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考古学家辛勤工作的不断持续，辽金墓葬壁画资料不断涌现，积累的数量日益可观。这无疑是辽金美术的一份欣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份欣幸。针对这批珍贵研究资料的出现，著名辽金史学家陈述先生，在中国辽金契丹女真史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上，已经为辽金美术史的研究发出过强烈呼吁^②。显然，如何利用这批地下材料来研究辽金美术史的发展动态，及其与唐宋美术的关系，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有效进展，将可望补足古代中国美术史中的一个

缺环。笔者读书期间,曾领受蔡鸿生教授关于历史学者应学会在“断层”上工作的教示,更加确定了选取辽代壁画墓作为一段时期之内的主要研究课题的信念。

墓葬壁画虽然无可疑问地属于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但这类世俗性的视觉艺术材料,又具有来自“地下”的特殊性质。如果说见之于记载的以及幸存于世的零星作品曾经为我们构制过一部属于古代上层社会的美术史,那么,这些曾经长眠于地下的材料的重新发现,今天使我们有可能做出一部属于民间社会、因而也就更能反映古代大众文化面貌的世俗美术史。巫鸿教授曾将中国古代美术中具有特定礼仪功能的创作活动和作品,界定为“礼仪美术”,作为丧葬文化之一部分的墓葬壁画,自然属于世俗美术中的礼仪美术这一范畴。以“礼仪美术”的视角研究饱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内涵、又承载着浓郁的丧葬观念和生死观念的墓葬壁画,却有着说之不尽的魅力。

选择宣化辽代壁画墓为题,与下述新材料的重新发现的背景有关:一,1975年以来陆续在河北宣化发现的九座辽代墓葬皆系汉人墓葬,不仅便于了解在辽汉人的生活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辽代汉人墓葬更能反映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在一特定历史时期相互影响、水乳交融的发展情形;二,九座辽墓中有八座为一家族墓群,其前后时间跨度仅二十余年,壁画题材与表现内容也在小变之中保持着明显的一致,因而可以作为辽代丧葬美术史中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横断面,来集中观察墓葬装饰在一特定时段、特定地域中的某些规律,这个横断面也便于相互参照地解决不同内容与题材在墓葬中的具体功能与意义问题;三,张氏家族世代务农,在整个辽代社会,属于中小地主阶层,故其墓地更能反映当时社会丧葬观念与丧葬美术的一般情况;四,墓葬壁画既是美术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生活史的问题,宣化九座辽墓的壁画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即包含着社会生活、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等许多方面,本身即是辽代社会生活的一个缩

影,因而可供观察丧葬美术受到各种复杂社会因素作用的客观情形;五,部分壁画内容,与画史所记同一时代的某些流行题材似有明显关联,或许有助于解释有关题材在当时流行的内在原因;六,九座壁画墓内容保存比较完整,其中反映的问题也比较集中,有利于以上研究的进行;七,将宣化辽代壁画墓群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案单元,其研究结果尽管不免有局限性,但通过与这个单元以外的大量辽代壁画墓资料的联系,却不难从许多共性规律中把握辽代丧葬艺术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中发展变化的基本动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宣化辽代壁画墓,正可以作为通向辽代丧葬艺术之历史长廊的一个入口。

本选题是在业师姜伯勤教授和芝加哥大学美术史系巫鸿教授的提议与鼓励下确定的。姜伯勤先生在其敦煌艺术研究中,已经注意到辽与西夏的问题,在具体分析过与本文有关的发现材料之后,认为从事这项研究很有价值;巫鸿先生已经开始关注辽代美术的研究,认为目前考古材料的积累,足以支持这项研究的开展。这一选题还得到了宿白先生、蔡鸿生先生、杨泓先生、马世长先生以及牛津大学的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的支持与关注。罗森教授不仅自己已经开始研究唐宋美术,而且也带领她的博士生将研究方向指向辽。在美国,由于曹星原(Hsingyuan Tsao)博士有关辽代绘画与墓葬壁画研究的带动,2000年7月在西海岸曾专门举行过一次辽代美术史研讨会;2005年3月,在美国亚洲学会第57次年会上,巫鸿教授主持的小组会议即以宣化辽墓为主题。由此可见,目前这一课题已经成为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

第二节 辽代文化特征与辽代壁画墓

直到20世纪初,内蒙古庆州发现了一座辽代帝陵——庆陵,有

关辽代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才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在此之前一直上追到辽亡的八百年间,我们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种辽代历史著作,而于辽代美术方面,除了有几幅零星的绘画作品留传于世,我们对这个朝代的了解几乎是个空白。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单一,有关辽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只能更多地依赖于考古发现的成果。

20世纪3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东北疆域为日本人占据之时,日本学者曾依仗日本人的军事力量,对庆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发掘与研究,并出版了有关的著作。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开始了对辽代碑板和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辽代文化的研究从而益加显示出对理解中国概念的重要。及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辽代考古工作取得了飞速进展,尤其在近二三十年间,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形象材料,从而使辽代文化艺术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出现了良好的势头。回顾前贤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 辽代文化的涵义

由于丧葬艺术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广义文化的研究成果也就必然地成为艺术研究的必要参照。所以,在具体介绍辽代墓葬壁画艺术的发现与研究状况之先,我们有必要略提以往有关辽代文化涵义的几种不同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辽帝国的范围内,同时存在着契丹文化和汉族文化两种文化,两种文化各自的成分随地区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混合,当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接触后,双方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了第三文化。即认为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之间组合,形成了辽文化^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契丹与汉族不仅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而且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封建文化所处阶段高于契丹,契丹遂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并仍